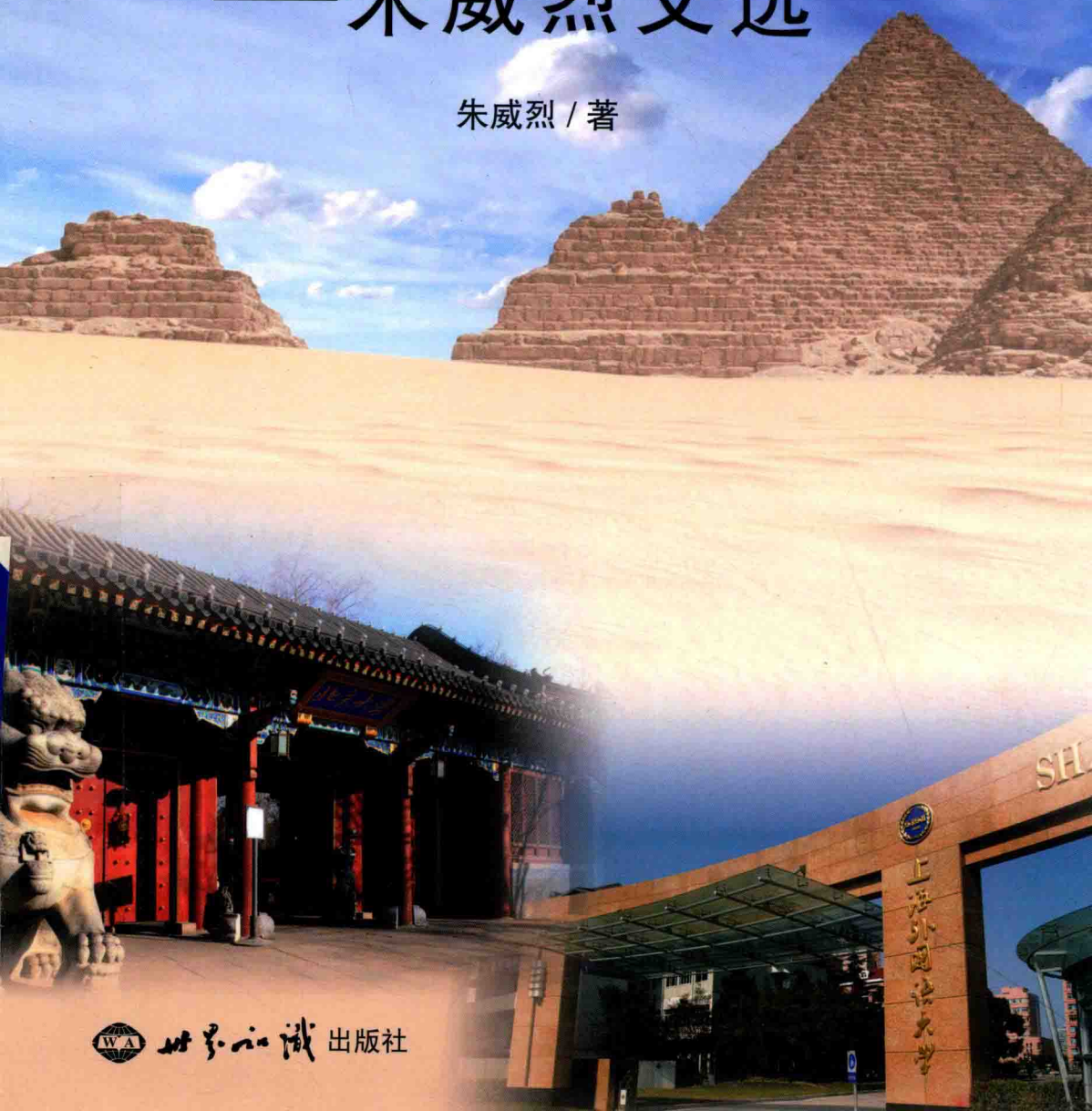


学思多议

——朱威烈文选

朱威烈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学思多议

——朱威烈文选

朱威烈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思刍议: 朱威烈文选 / 朱威烈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012-5569-6

I. ①学… II. ①朱… III. ①阿拉伯语—教学研究—文集
②中东问题—文集 IV. ①H379.3-53 ②D81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11305号

书 名

学思刍议——朱威烈文选

Xuesi Chuyi — Zhuweilie Wenxuan

作 者

朱威烈

责任编辑

贾如梅

责任出版

赵 玥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 × 1092毫米 1/16 21¼印张

字 数

285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8月第一版 2017年8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569-6

定 价

58.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由上海高校智库——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资助出版；成果属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高校智库、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市I类高峰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上海高校一流学科（政治学）建设项目。

目 录

写在前面：我的一点学术追求.....	1
--------------------	---

上篇 学科建设

德艺双馨 一代师表.....	2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印象中的纳忠教授.....	30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力作 东方学园圃里的硕果.....	36
《阿拉伯文化背景知识基础教程》序.....	40
马金鹏先生：一位承前启后的穆斯林学者.....	44
汉回学者和谐合作 共建我国阿拉伯学.....	53
祝贺《汉译〈古兰经〉史话》扩展内容结集问世 ——序《〈古兰经〉在中国》.....	62
一代名师，魅力永存 ——纪念刘麟瑞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65
缅怀阿语教育先辈 推进阿语学科建设.....	69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阿拉伯语学科建设30年回眸.....	74
知难而进 磨杵成针.....	89

创建传统，彰显特色

——新中国阿拉伯语专业一甲子谈	94
坚持走学科内涵发展的道路	107
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112
我与译事	118
十年铸一剑 俯仰不愧怍	
——祝贺李振中教授《历史绪论》译作问世	135

下篇 研究论述

看《克莱默夫妇之争》之后	143
简述比较文学的产生	150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代前言	159
从文化战略视角看季羨林先生的学术思想	163
《国际文化战略研究》绪论	169
《当代中东国家社会与文化》总序	179
对美伊战争和我能源战略的思考	185
处在十字路口的伊斯兰世界	191
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革	198
《意见与异见——半岛电视台的崛起》序	207
是纪念文集，更是历史文献	212
伊斯兰文明与世界	217
一个特色鲜明、影响不凡的学术交流平台	228
关于我国外语院校加强科研工作的几点看法	232
理解与尊重：关于构建我国对中东研究话语体系的思考	241
《中东政治与社会》序	256

中国热点外交的机制与经验

——以多边主义外交机制为视角	261
关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略的思考	273
《伊斯兰激进组织》序	282
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性关系	286
把握机遇，选准路径，实现宁夏新腾飞	306
抓住当前契机 加强对外开放的能力建设	316
积微成著 集腋成裘	
——祝贺吴思科大使文集问世	323
“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构建世界文明价值共同体	327

写在前面：

我的一点学术追求

年届七五，迟暮之感自很难免，一生顺逆境遇会不时跃然脑际。回想起来，童年岁月幸赖慈父母荫庇而快乐无忧；青年时期虽生活条件、客观环境屡历艰辛，然终能自勉自励，不堕心志；改革开放以来身心俱获解放，是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学人均额手称庆，可以专心做事做学问的好时代。如果说个人还有点尚堪说道的话，那主要在这三十多年。

我这数十年经历虽有起伏，但总体平常，概而言之，可谓一生在学：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读书求学，到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逾半个世纪的执教生涯，都未曾离开过学习。中国古训“活到老，学到老”，反映了中国文化文明的本质是学习。中国学人特别是教师，能始终置身于学习的环境和氛围中，是一件幸事。

只是就学习而言，我虽努力追求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但毕竟才蔽识浅、心多旁骛，终难渐臻其境。而今则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更只能怅怅自叹。勉强要说一点治学心得，那便是学科建设——它贯穿了我教师生涯的心路历程和工作轨迹。

我幼少年时在西子湖畔度过八年，养成了好幻想、多憧憬的心性。中学阶段在沪杭两地读重点中学，培育起了较强的比赛、进取精神。北大五年，则得以拓宽眼界，在潜意识里确立起大多数同龄人都

具有的家国情怀。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从报效祖国的高度检视自己的生平，我能述及的有意义工作，主要是推动学科发展、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工作这几个方面。

从术业有专攻到加强学科建设

术业应有专攻。我常扪心自问是否够得上术业有专攻？因为这是身为教师的基本条件。我这一代人，年轻时受到的教育是“服从组织分配”。学习阿拉伯语的起因是临考前中学校长谈话指定，要求报考外语小语种；进入北大东语系阿语专业则是系主任季羨林教授的引导和系里的统一安排；分配当大学教师——先是年级主任李振中老师谈话确定我留校，旋即又被高教部外语司调派到上外任教——也都属“组织决定”，从思想和行动层面都必须服从。大学毕业生个人能提出要求的通常只是希望“专业对口”。就此而言，我算是“得偿所愿”。工作以来，前期经历“文革”，下乡下厂频繁，还两次下放去安徽凤阳五七干校，折腾折磨不断，多亏有阿语这“一技之长”，才不时被指派去完成一些译事；后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繁荣，我在上外工作生活稳定，职务虽有变动，却始终没有脱离以阿语专业为基础的业务工作。

那么，学习阿语专业的人怎么才算“术业有专攻”呢？黎巴嫩出版的英阿词典《泉源（AL-MAWRID）》中对 Arabist 词条的释义是“熟谙一切与阿拉伯人及其地区或阿拉伯语言与文学的权威专家”，亦即俗称的“阿拉伯通”。这抑或指两类人，一类不要求通晓阿拉伯语，但必须了解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地区，包括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社会等，学科范围未作限定，但应是专家；另一类是掌握阿拉伯语言文学的行家里手，与我国开设的阿语专业教学目标颇相一致。

从专攻精神和成就看，师辈的马坚先生、纳忠先生和刘麟瑞先生等，始终是阿语专业后人们的榜样。他们及其20世纪30年代前后共六

批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的同学们，为中国的阿语教学和阿拉伯研究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和铭记的史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阿语专业的教师们编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工具书，翻译各种著作，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等，硕果累累，实际上都反映了他们重视传承、继往开来的时代风貌，也是术业有专攻的证明。我的理念与阿语教师们是相通的，经历也相仿，是上述专业活动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译过一些著作，近年出版的拙译作选《岁月留痕》即是出于存念的表现。1976—1978年上课之余，曾与一位专攻韵律学的伊拉克外教哈纳菲先生一起编写过工农兵学员三个年级的教材。1984年起担任系行政工作后则主要组织系内教师编写精读、语法、应用文、口译教程、阿拉伯国家概况等教学用书，自己也审校过其中几种。90年代头尾我还先后编写出版《当代阿拉伯文学词典》和《简明汉阿词典》两种工具书。那是因受译林出版社李景端社长和上外副校长吴克礼教授之托，难以推诿，也是基于内心一直很认同马坚、刘麟瑞先生编写词典的奉献，视之为中国阿语学者应尽的职责所致。

独特的编辑生涯。回想起来，我的关注面和业务实践虽与高校阿语专业教师颇为相似，但也不尽相同。其中，长达三十多年的编辑工作可称独特，对我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范围拓展影响至为深刻。

1980年我结束开罗大学进修两年后回国，蒙上外王季愚院长器重，被任命为《阿拉伯世界》期刊主编。那是系里讲授阿拉伯国家概况课的老教师陈慰慈倡议编辑的一种油印本，我的任务是使之规范化、成为正式出版的期刊，为阿拉伯语专业师生和关心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知识的学人提供一个学术园地。我接手后，先是出了六期胶印本，作为内部交流的试刊。1983年正式具文向教育部申请获准才公开发行。初为小32开，季刊，90年代转成16开，双月刊。2006年为加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中东研究所建设，我们决心将它办成学术期刊，改名为《阿拉伯世界研究》。当时向教育部社科司主管领导袁振国副司长汇报时，他曾表示惋惜，问能不能出成两种，把普及知识型的《阿拉

伯世界》保存下来？但终因人手、技术层面等各种困难，我未敢应允。

在上外阿语系这样的教学单位办刊物，工作量计算和成绩评定等都得不到制度保证。我在主编这本期刊的前二十多年里，约稿改稿校对，确定栏目、封面，处理信函，到北京外文印刷厂买铅字，到校印刷厂跟师傅一起排版，甚至发行邮购等一应繁杂事务，均亲力亲为。有一段时间编辑部教师都出国了，只能独自包揽应付。

编刊物辛苦艰难，是“为他人作嫁衣”，要有一点牺牲精神，但看到阿语学人和关心阿拉伯伊斯兰的学者和读者热情的来稿和来信，特别是看到不少教师在职称晋升时用上了这本刊物上发表的成果，心中也就很欣慰。我对纳忠教授始终心存感激。他在这本刊物从创办到公开出版的前二十多年里，一直鼎力支持，凭藉他的声望和影响广泛推介，并亲自撰稿荐稿，是刊物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与刘麟瑞教授发表的连载回忆录，李振中教授将他的《学者的追求·马坚传》书稿先行在本刊上披露，中央民族大学林松教授对《古兰经》中译本的系统评述等作品，都代表了中国穆斯林前辈学者对这本刊物的珍视和器重。我还记得，香港沙义坤先生是成达师范毕业生，曾多次致函编辑部，嘱向刘麟瑞先生等老学友问候；90年代初，台湾海维谅先生访沪，虽年事已高举步维艰，仍坚持让其亲戚扶着来访，一抒对刊物的褒词，足见境外同胞对刊物的惓惓之意。国内中青年阿语教师对刊物更是关爱有加。其中，对外经贸大学的葛铁鹰老师颇具代表性。他在新世纪初的五六年间，开设“天方书话”专栏，评析中国文化名人与阿拉伯文学的关系，介绍阿拉伯古今名著及其中译本，以后又连载十多期发表“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反映了他长期重视收集资料，用心思考并勤于耕耘的良好习惯，是很值得肯定的嘉言懿行。2006年刊物改名为《阿拉伯世界研究》后，支撑它的主要学科转为政治学二级学科国际关系，作者队伍中除阿语教师外，更多的是关注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编辑部此时已有专人负责，进入规范化建设，我无须每稿必审，文字工作和其他事务性负担都大大

减轻，精力和时间得以集中用于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和学科发展方面。办刊三十多年，接触到的上千万字稿件，涉及多种学科知识，迫使我不得不去寻索阅读、查资料核对，有点像是在走杂家之路，不过这对我接受并确立新时期学科交叉融合的理念却帮助很大。

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之大端。1984年起阿语专业在上外独立建系，我开始走上管理岗位。此前，1981年国家已实行学位制，接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于1983年、1984年开始公布有权在外语学科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和研究单位名单。由此，师资队伍、学位与学科建设已然成为高校的核心工作。其中的师资队伍乃为关键，是申报学位点和推进学科建设的基础条件。上外阿语专业要想形成一支合格的师资队伍，我想，除了引进和自己培养，别无良策。

当时国内设有阿语本科教学点的高校仅七所，在职教授仅北外纳忠先生一人，副教授也极少。为此，我在请示胡孟浩院长同意后曾专程赴北大，想请刚退休不久的刘麟瑞先生南下坐镇领衔。刘先生和师母闻讯后虽都很高兴，但顾念家庭基础在北京，赴沪工作实有困难，提出可到上外来讲讲，以后也愿协助编些教材。我告别刘先生后不期在校园里邂逅季羨林教授，他时任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胡孟浩院长为副会长。季老问我：“怎么到北大来了？”我答：“上外缺菩萨，胡院长同意我来搬菩萨”，并讲述了刘先生的情况。季老说：“回去给你们胡孟浩院长带句话：没有大菩萨，就自己培养几个小菩萨，积以时日，小菩萨不就成为中菩萨、大菩萨了吗？”我回校向胡院长作了汇报，他深以为然，后即制定了学术梯队建设计划，报教育部高教司批准并转发其他高校，校内则于1985年开始推行。梯队建设实际上是季老强调“自己培养”理念的实施路径，它从制度上保证并积极有效地推动了校内的师资队伍发展。1985年，上外阿语系自1960年建专业以来第一次评出了三名副教授，具备了申报硕士点的条件，于1987年开始招生。1988年，在北大陈嘉厚、郭英德两位教授和国际广播电台华维卿译审支持下，我被破格晋升为教授。那时的《光明日报》头版

报道上外梯队建设文中，曾把时年46岁的我列为“年轻”文科教授的例证。翌年，上海市教委正式下文同意上外有权评审英、俄语外的其他外语专业教授资格，由我担任专家组组长。应该说，是季老的“立足自己培养”思想和胡孟浩院长与时俱进扎实推进梯队建设的举措，惠及了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中青年外语教师的成长。申报博士点则有些曲折。90年代国务院外语学位评议组有好多年是按照学生规模确定申请博士点的语种，阿语一直未被列入，学校也未敢擅报。我当时已是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阿语指导组组长，心里着急却又无奈。直到时任国务院外语学位评议组组长的陈嘉厚教授直接询问上外有关领导：“阿语为什么不报？”我们这才行动起来，于1998年申报获得了博士点授予权。

这里，我要特别提及的是母校北大对我成长发展历程中的关爱和支持。在学期间的1964年秋我刚进入大五，北大开展“小四清”，对学生而言，就是检查自己是否有“和平演变因素”。进驻东语系的是暨南大学党委书记率领的工作组。我因大三时译过一本书，间接受到过马坚先生的赞许，这时就成了“有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和“资产阶级教授接班人”的证据。我不但得在班级里作检讨，而且还被叫到系里谈话，精神压力很大。那次谈话安排在系主任办公室。工作组同志见我到后便问季羨林主任：“我们就在这里谈？”季主任说：“你们谈吧，不妨碍我。”工作组同志问我的核心问题是“你是谁的接班人？”我当即回答：“我是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之一。”接着便讲述了译书的缘起、过程和跟马坚先生的接触等情况……他只问只听，不做结论。临结束了，他征询季主任意见时，季老才从办公桌前移座过来说：“这个朱威烈，我了解，是校合唱队指挥，表现很好……我看，朱威烈还是要求进步的，就是有些骄傲自满。”我回了一句嘴说“已经好多了”，又被季主任批评了几句，还举了“欧洲文学史”考试我交卷早的例子。但我出门时已经感受到季主任实际上是在帮我解围，把当什么阶级接班人的思想政治问题转成了戒骄戒躁的作风问题。这

在当时，可是攸关我毕业分配及至一生发展的大事。1965年春快毕业了，国内举办埃及电影周，文化部向北大借八名学生做翻译，年级主任李振中老师召集全班开会，宣布名单，我居然也在列。李老师知道我会觉得意外，特别让我留下来谈话，嘱我不要背包袱，而应配合带队的吕学德老师，好好发挥业务作用。改革开放后的1987年，季老应胡孟浩院长之邀到上外来接受名誉教授聘书。我陪他进入会场时，胡院长迎上来说：“今天我们有幸聘请季老为名誉教授，希望季老今后多关心支持上外的发展建设。”季老一面拍拍我的肩膀，一面说：“我把这样的学生都送到上外来了，还不关心支持吗！”这些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点点滴滴都在心头。

季老、陈嘉厚老师、李振中老师和北大教过我的老师，以及没有教过我的北大其他院系的师长、学友或学弟学妹，在我的学术成长和在上外推动阿语学科、政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对我的呵护、提携、支持和帮助，是我常铭在心、永世难忘的师门恩情。

坚持走学科内涵发展的道路。回想起来，我在阿语专业队伍中可能算是个规则意识和好胜心都较强的教师。设立博士点后，我想争取的即是跻身全国重点学科。然而，小小的阿语学科要与文史哲政经法等重点学科比肩，大是不易，即便要赶上外语学科中英、俄语的水平和影响，差距也很大。因此在我看来，阿语学科要攀高峰，唯有秉持小学科大内涵的理念，拓展与阿语相关的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朝“高水平，有特色”的方向努力，才有希望。在2000年12月教育部批准上外中东研究所为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前后，我已经有意识地在推动翻译、编写有关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文化、宗教、国情等方面的材料和著作，以丰富阿语学科的内涵建设。2001年上海市教委来上外考评学科建设时，对以阿语学科博士点为基础的中东研究所成绩给予了肯定，但也批评我们为什么不申报国家重点学科。其实，那时允许上外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限额是两个，学校领导的意见是要确保英语、俄语，岂容他人造次？何况我当时已不直接负责阿语，也讲不上话。

尽管如此，上海市教委还是把上外阿语列为上外唯一的上海市重点学科。2003年，我与接任上外社科院院长的优秀海归学者张曙光教授，联手整合校内以中东研究为特色的国际问题研究资源再次申报国际关系博士点获准，上外第一次出现了除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外的社会科学学科博士点。2007年，已任副校长的张曙光又与我分别领衔申报国际关系和阿拉伯语两个上海市重点学科，都取得成功。同年，教育部也开展评审国家重点学科，上外的限额为三个。学校同意除英、俄语外也申报阿语。由我负责定稿的主报告，将阿语系教师编写的国家级教材、获奖教材等与中东研究所学术成果中的有关阿拉伯国家研究的省部级课题、论文和咨政服务等积累结合在一起，大大扩大了阿语学科的内涵，从而较好地回应了教育部规定的目标要求。11月，教育部正式下文批准上外阿语学科列入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建设。那一年各高校申报通过的新重点学科，都有“（培育）”两字。印象中，国内高校以阿语为二级学科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迄至当时仅上外一家。对此，我当然很清楚，阿语能进入国家重点学科只是相对而言，论学术水平和社会贡献，距离国家标准依然很远，但内心毕竟很愉悦，因为从中国阿语教育发展史看，这总是一个标志；作为以马坚、刘麟瑞为代表的北大阿语教师的学生，是交出了一份不辱师门的成绩单；在祖国人文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阶段，也算是把握了机遇，通过竭诚努力，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

见证上外向多科性大学发展历程。我在北大五年，经历了困难时期，到十三陵修铁路，去大兴县割麦，赴平谷搞“小四清”等运动，但在校内却常能听到不少高水平的形势报告和学术讲座，担任校合唱队指挥又与各系科的同学甚至老师多有接触，交流的知识也广。到上外来工作后，一直很不适应的是单一外语学科高校那种特有的学术氛围：除了外语的听说读写基本功教学训练，外国文学都很少谈及，遑论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文革”后的1978年，国家教委开始通过考试遴选首批出国进修教师，上外考取四名，阿语、法语各两名。临行前，

已经复出的王季愚院长专门找我们谈话，要求除业务进修外，也要关注一下国外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建设。1980年9月，除阿语陈中耀老师因读研究生获准延长一年外，我和分赴法国、加拿大的张以群、张裕禾都已回国，王院长又约时间听取我们汇报。我当时讲话颇“冲”，说光注重听说读写的外语学校不是大学，大学应讲学科，课程应有史有论，云云。会后我心里很不安，生怕冲撞了这位深受广大师生爱戴的老革命、老外语教育家。不料时任人事处长组织这次座谈的王益康同志告诉我，王院长听汇报后不但没生气，反而很高兴，说上外要发展就应多依靠这些我们自己培养的出国教师。接着，王院长的学术秘书、《外国语》学报负责人李良佑也对我说，王院长正在准备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发言稿，要把上外办成大学。这就是后来王院长发表在《外国语》1981年第5期上的《回顾与展望》。文中明确指出，“专门性的外语学院……有不少缺点，如清一色的都是外语专业，容易造成学生知识面过窄，学术思想不活跃，不少课程或研究课题因师资缺乏而难以开设或开展，也不便于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因此，她建议“有条件的外语学院是否可以办成大学，适当扩大规模，增设一些人文学科的其他专业或系”。她这篇被称为共和国新时期外语教育“出师表”的遗稿，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高瞻远瞩地提出问题、筹划未来，准确反映了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规律，也代表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外语教师的心声。

1981年5月，王季愚院长终因“文革”中备受迫害和摧残而过早病逝，年仅73岁。接替她的胡孟浩院长在继承王院长遗志、推动上外向多科性外国语大学发展方面，殚精竭虑，务实施策，为奠定今天上外多学科格局的基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记得1985年他曾约我商谈，如何把上外建成大学。我按照国家教委文件有关大学必须拥有至少三个一级学科的规定，提请胡院长研究依靠上外薛蕃康、漆竹生、钱维藩等老教授，推动创办商、法和新闻等新专业或系的可能，并建议可适当借鉴过去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努力保持各专业都有较强的

外语特色。之后，胡院长便要求我到全校相关部门作个调查，鉴于我在上外资历尚浅，他指定由教务处长麦毅强同志配合我走访。这实际上是为校领导制定“七五”规划提供依据。

上外在国内外语院校中开设非外语的文科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做法，在80年代遭到其他外语院校的批评和反对曾持续多年，但在教育部和上海市的支持下，胡院长及其领导班子坚持了下来，校内新设的外经贸、国际新闻等学科，无论招生还是就业情况，都一直很令人鼓舞。这是上外史上一次成功的转型发展。1993年教育部终于批准我校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还荣幸地请到江泽民主席亲自题写校名。

申报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上外设立国际关系专业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始于俄语教师们的苏联问题研究，之后才逐渐扩大到其他国别区域研究。1996年1月我调任上外社科院院长时，国际关系硕士点已经建立，还办有《国际展望》期刊。我只是在规范研究生课程、期刊发行和组织研究人员申报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等方面做了些推动工作。短短几年，即取得显著进展。这说明外语教师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既有潜力也有优势，应有可能在学位点建设方面再上一个台阶。世纪之交，我们曾申报过一次国际关系博士点，虽未成功，但通过比较，知道了差距和问题所在。2003年再次申报时，上外与中国社科院两家终于在19个申报单位中胜出，获得了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授予权。成功的原因，一是张曙光教授的加盟，弥补了我们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大国战略研究方面的不足；二是作为教育部国际片重点基地中东所，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先后发生的形势下，广受各方关注，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明显上升；三是在华师大姜琦、复旦俞正樑等教授的指导下，填表更趋严谨和规范。

在教育部的国际片重点基地中，上海占三家：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华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上外中东所。复旦、华师大都已有政治学博士点。上外国际关系博士点的建立，是迈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一步。从历史看，符合王季愚、胡孟浩等外语教育前辈建设外国语大学的办